

評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366 頁+書目 9 頁。

陳永發*

毛澤東已經去世二十七年，他一生引以為傲的文化大革命今天也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那是政治運動勢若狂風暴雨的時代，階級鬥爭的口號喧天價響，紅衛兵和造反派高喊「向工農兵學習」，人人揭發「大公」，畏於言私，更怯於言利；鄧小平執政以後，停止了政治運動，也取消了階級鬥爭，大部分的老百姓忙於發家致富，平均個人所得由 100 元美金不到迅速提高到 1000 元左右。不過，國營企業工人大批下崗，千萬農民形成遊走於城鄉之間的民工潮，私人資本家不僅捲土重來，更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什麼中國大陸出現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不追溯已經為大多數人所遺忘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可能清楚回答這個問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為確保中國的社會主義永不變色，他沒想到事情的發展恰恰和他的期望相反，發動文化大革命反倒成了自掘墳墓，加速將中國社會主義埋葬。

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當代史中既如此重要，然則有關研究卻是屈指可數。能以一個政府部門為範圍，有系統的探討文化大革命期間，如何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如何展開權力和路線鬥爭，如何繼續執行任務的作品，更是未曾聽聞。馬繼森女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在外交部工作，她敢於打破中國大陸的政治禁忌，大量搜集這二十幾年來披露的各種原始文件和有關資料，尤其是許多現在中國大陸仍然視為國家機密的各種外交部內部出版品，加上口述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訪問，重建並反思文化大革命在外交部中光怪陸離而且複雜萬分的歷史過程，實在難得。她從外交部黨委派工作組領導運動，到造反派起來打倒部長陳毅；從前期棄卒保帥，批鬥權力邊緣人物，到後期清理階級隊伍，製造五一六兵團冤案；又從外交部如何陷入反帝國主義和反修正主義的激情漩渦，到如何恢復正常運作，都梳理清楚，明白交代。

馬繼森女士不爲尊者諱，據實直書，文化大革命並非林彪和江青等人欺上瞞下的產物；實乃毛澤東「乾綱獨斷」所致，不但林江等人奉行無疑，連周恩來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鬥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也都奉行無疑。差別恐怕只是，林江等人原來身在黨國體制的「邊緣」，經常想要顛倒既有體制，批鬥老幹部決不心慈手軟，而周恩來等人則是原有黨國體制的權力「核心」，經常想要維護既有體制，對老幹部強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不過，文化大革命畢竟是新生事物，毛澤東希望透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改造黨國體制的上層，把鬥爭矛頭指向劉少奇等領導人物。許多「老革命」因而有碰到新問題的困惑，有時不知所措；至於「新革命」，因爲享有批判官僚主義的無限自由，則經常把毛澤東的一些口號推到邏輯極致，語不驚人死不休。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老是強調黨內團結，黨內卻始終遭受派性思想和宗派主義荼毒的根本原因。

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最初的反應總是老辦法。所以文化大革命初期像中共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一樣，都是由黨委書記發縱指示，造成到處響應的巨大聲勢，再根據上級透露出來的口徑，尋找替罪羔羊，對他們上綱上線，甚至製造莫須有的罪名。老革命只是沒想到毛澤東竟然會把政治運動的矛頭指向劉少奇所代表的官僚體制上層，更沒想到思想改造和政治整肅之間的界線會迅速模糊，竟然株連到自己。然而，習慣於服從毛澤東，理解的固然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甚而刻意琢磨毛澤東的意志，所以儘管內心不同意毛澤東的作法，卻隨著毛澤東的音樂指揮棒起舞，有時直到自己在這個過程中變成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對象，也仍然九死而不悔。

馬繼森女士描述的外交部長陳毅，就是這樣一個老革命。他在毛澤東未表態前，反對私自揪鬥國家主席劉少奇，面對紅衛兵和造反派打倒一切的過

火行爲，更曾厲聲斥責，義正詞嚴，表現出嶙峋的風骨。不過，陳毅畢竟是有豐富黨內鬥爭經驗的模範共產黨員，因此，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以黨的「老」辦法響應毛澤東號召，故曾默許工作組上綱上線，批鬥無辜下屬，把沒問題說成有問題，把小問題說成大問題，從而製造了一些冤假錯案。所以當毛澤東批評工作組時，陳毅立即進退維谷。因爲主張打倒陳毅的年輕幹部有毛澤東的指示爲憑，更有自己遭受迫害的事實爲據，並非全然無的放矢。其實，即便這些年輕幹部上綱上線，也是有樣學樣，使用手法和陳毅並沒有嚴重差別，都是中共建黨以來政治運動的一貫傳統。作者因而感嘆說，造反派秉承毛澤東的旨意，經周恩來點頭後批鬥陳毅，固然製造了一宗大冤案，但是陳毅奉行周恩來轉來的毛澤東指示，在外交部內展開批鬥，又何嘗不曾製造過一些小冤案？言下之意是，中共政治運動的傳統應該痛加檢討。

關於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馬繼森女士也實事求是，強調「在已經樹立的毛的絕對權威面前，他無條件服從，並以維護這個權威爲己任。」她清楚指出，周恩來固然像陳毅一樣，刻意保護了許多老幹部，勉強維持了外交部的運作。但是正因爲他無條件服從，不願意正面制止紅衛兵和造反派的過火行爲，所以過火行爲纔會不斷發生；到他想要制止時，經常只能啞膺莫及。以批鬥陳毅一事爲例，周恩來順從毛澤東的意思，容許紅衛兵和造反派批鬥陳毅，指示陳毅做違心的檢討，然而一旦做出決定，事情便不一定能按照主觀的願望發展。1967年8月，他親自主持批鬥陳毅大會，陳毅按照事前商量做出違心的檢討，但是批鬥既然展開，便有其自己發展的邏輯，紅衛兵和造反派於是和「當時盛行的大批判一樣，歪曲事實，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結果陷己於不義。同樣，馬繼森女士指出，外交部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清理階級隊伍，也像當時其他單位一樣，任由軍代表馬文波、副部長姬鵬飛、毛澤東的姪女王海容等人以「逼供信」的手段，追查根本不存在的五一六兵團，結果株連了許多無辜；外交部經驗變成樣板以後，更是流毒全國。或許周恩來內心不一定同意毛澤東關於五一六兵團的指示，然而全力加以執行，結果只能製造慘劇和悲劇。

其實，如果馬繼森女士把討論的視野擴大到外交部以外，就不難發現，

周恩來先後主持批判劉少奇、批判陳伯達和批判林彪等工作，所用手法也無法完全避免「歪曲事實，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等弊病。我們還會發現，周恩來無條件服從毛澤東，爲了維護毛澤東的權威，累次做違心檢討，厚誣自己。可是毛澤東明明知道國民黨報紙曾經假借周恩來的名義登廣告唾棄共產主義，卻始終不願做強而有力的澄清，總要等他替自己戴上幾頂不適合的帽子以後纔恢復寵任。周恩來逆來順受，對毛澤東始終像 1930 年代侍候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一樣，忠心耿耿，不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忠實貫徹毛澤東旨意，也容許自己被毛澤東玩弄於股掌之間。

從把毛澤東當成黨的化身和維護毛澤東威信這兩點來說，無論陳毅還是周恩來，都可以說是中共黨員的楷模，但是從嚴格的黨性標準而言，他們都不是沒有可以質疑的地方。兩人都在 1940 年代延安整風中遭受嚴厲批鬥，當時也都在「同志」的幫助下做過違心檢討；文化大革命期間，故事重演，他們服從毛澤東的指示，屢次縱容冤錯假案的發生，也屢次做違心檢討。從黨性原則上講，他們是否混淆了黨組織和毛澤東之間的分野？他們不實事求是地對人對己，是否「欺騙」了黨？除了毛澤東的意志以外，他們是否應該想一下，中國人民難道沒有超越毛澤東意志的國家利益？周恩來這樣做是不是中國老百姓所謂愚忠？馬繼森女士雖然沒有直接面對這些問題，但是她一再指出，周恩來從不在毛澤東追求的烏托邦思想中尋找錯誤的根源，刻意曲從，只在執行層次反省檢討，即便補苴彌縫，仍是倒本爲末，所以結果只能助長毛澤東的錯誤。

馬繼森女士不願苛責周恩來和陳毅等重要歷史人物，卻堅持全書「紀實」，因此竭盡所能地呈現她所認爲禁得起史料考驗的「史實」。雖然沒有解釋周恩來等外交官員爲什麼服從毛澤東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或相信毛澤東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也沒有解釋他們爲什麼爲了維護毛澤東的威信，不惜犧牲人格，厚誣自己，並容許冤錯假案層出不窮。然而這本書把外交部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複雜歷程敘述得有條不紊，不僅破除了毛澤東、周恩來和陳毅對文化大革命完全沒有責任的政治神話，也廓清了官方一面倒指責紅衛兵和造反派打砸搶和搞奪權鬥爭的歷史迷霧，這是一本了解文化大革命真相的重要書籍。